金介甫英译《边城》中文化移植的操纵理论考察*

刘汝荣
(吉首大学,吉首 416000)

提　要: 本文在"操纵理论"框架中考察金介甫英译《边城》中文化移植的操纵因素以及文化移植实现的途径。笔者认为,个人意识形态操纵译者选择作者和作品,社会意识形态操纵译者选择翻译策略和手段,文本内、外因素共同作用于原语文化移植,使原语文化在译语文本中得到提升、处理或畸变。畸变的文化移植或许与译者的文化身份有关。

关键词: 金介甫 《边城》; 文化移植; 操纵理论
中图分类号: I04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 - 0100(2014)06 - 0154 - 5

Cultural Transplantation in *Border Town* Translated by Jeffrey Kinkley

— An Analysi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nipulation School

Liu Ru-rong
(Jishou University, Jishou 416000, China)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manipulation factors resulting in the cultural transplantation of *Border Town* (2009) which is translated by Jeffrey Kinkley. It is held that the selection of a writer and a source text is manipulated by the translator's individual ideology, the strategies employed for the translation is manipulated by social ideology, and the cultural transplantation is a function of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factors of the text. Manipulations as improvement, handling or distortion are carried out with the elements loaded with cultural connotations in the source text. The distorted cultural transplantation is probably related to the translator's cultural identity.

Key words: Jeffrey Kinkley; *Border Town*; cultural transplantation; manipulation school

1　引言

操纵论(the manipulation school)是翻译研究文化学派在 20 世纪 80 年代后发展起来的新理论。其奠基人 Hermans 认为,从目标文学视角看,"所有的翻译都意味着为了某种目的对原文本进行某种程度操纵"(Hermans 1985: 11)。Lefevere 引入"改写"(rewriting)概念,泛指翻译、改写、批评和编辑文学原作等各种加工和调整过程,强调"意识形态"(ideology)、"诗学"和"赞助人"对翻译行为的操纵(Lefevere 1992b)。"这种对文学翻译的重新定义可以提供一种方法,以便理解复杂文本操纵过程的产生,包括如何挑选翻译文本……译者在文本挑选过程中的作用,编辑、出版商、赞助人各自担当的角色,译者决定翻译策略的标准以及译文文本在目的语系统中如何被接受。"(Bassnett & Lefevere 1998: xi)

《边城》是沈从文发表于 1934 年的现代牧歌式小说,被刘西渭誉为"一颗千古不磨的珠玉"、"一部 idyllic 杰作"(刘勇 张睿睿 2007: 136)。金介甫翻译的《边城》(*Border Town*)(2009)是迄今最新的英译本。本文从操纵理论角度考察金译《边城》中文化移植的操纵因素以及操纵的实现途径。

2　意识形态对译者的操纵

"翻译不在真空中进行,译者总是在既定文化和时间中翻译。"(Lefevere 1992a: 14)对于文学作品译者而言,操纵其翻译行为的一个重要因素便是意识形态。后者分为个人意识形态和社会意识形态,它可能对译者选择主题、运用翻译方法以及处理细节等产生巨大影响。

2.1 个人意识形态对译者主题选择的操纵

金介甫被誉为国外沈从文研究第一人。金介甫 1972 年开始研究沈从文时,沈从文在中国国内还不被认可,甚

* 本文系湖南省社科基金项目"武陵山片区民族文化外译研究"(12WLH39)的阶段性成果。

?1994-2015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至很少有人知道他是作家，是金介甫认识到“沈从文对于世界文学有着卓越的贡献”，并且充满信心地期待“那样的一天必定会到来，即不再把他的作品局限在乡土方面，也不仅专供中国人研究，而要步入世界文学的领域”（同上：新版序）。金介甫说，“我认为沈的杰作可以和契科夫的名著媲美”，“《边城》不像《包法利夫人》那样写得富于启发性，却像《项狄传》那样独出心裁，像《追忆逝水年华》那样扎实”，并且把沈从文看成跟“福楼拜、斯特恩、普罗斯特成就相等的作家”（同上：引言）。在 *Border Town* 的序言中，金介甫再次表达对《边城》的赞美之辞，认为《边城》同赛珍珠获诺贝尔奖的《大地》一样，是一部伟大作品，并且《边城》更加具有地域性、中华民族性、艺术创造性（Kinkley 2009：Foreword）。

2.2 社会意识形态对译者翻译策略的操纵

金介甫在 *Border Town* 中采用异化为主的翻译策略，采用“厚译”（thick translation）（Appiah 1993）、“细译”（close translation）的翻译方法，“体现出最大限度地再现原文的努力”（徐敏慧 2010：224）。从客观社会意识形态看，21 世纪，随着中国经济实力增强、中西文化交流不断深入和中国文化“走出去”政策贯彻实施，许多重要的中国文化、文学典籍均已译介到西方。西方读者对中国产生浓厚兴趣，他们希望更多了解中国和中国文化。《边城》中湘西文化的独特性和异质性是吸引读者的一个重要资源。《边城》是“沈从文笔下迥异于西方世界的作品，正好契合他们对东方的浪漫幻想、神秘情结”（刘勇 张睿睿 2007：122）。金介甫将《边城》中那个神奇丰厚、未曾被近代文明沾染的湘西世界的文化原原本本地呈献给目的语读者，正好契合此时的读者期待。

3　文本内、外因素对文化移植的操纵

“翻译永远不会发生在真空里，它总是发生在一个连续体里，译者受到各种文本内外制约因素影响。”（Bassnett 1998：123）文本内、外因素操纵译者，译者操纵译本。操纵可能是提升，可能是妥协性处理，也可能是畸变或失败。操纵主要是译者有意为之，也有可能是无意为之。无意为之的操纵或许与译者疏忽或误解有关。下面，结合 *Border Town* 中的具体例子分析操纵的文本内、外因素及操纵实现的途径。

3.1 操纵提升

3.11 异化保真

Border Town 很多句子是直接用“本土文化材料组成的”，作用是“把外国文本中的语言文化差异注入目的语中，把读者送到国外去”，目的是“为目的语读者提供一次前所未有的阅读经验”（Venuti 1995：20）。

① 无事不登三宝殿。坐了一定就有话说。（沈从文 1983：150）/They say one doesn’t go to the Temple of the Three Buddhist Treasures without a good reason. If you sat down there you must have had something to say.（Kinkley 2009：140）

译者避免牵强采用译语读者文化中相近的表达式 the Hall of Trinity，而是根据本义采取直译方法，将“三宝殿”译成：the Temple of the Three Buddhist Treasure.“三宝殿”是清静高洁的佛教重地，不可随意乱闯，所以“无事不登三宝殿”是具有浓重佛教传统的中国特有的俗语。中国的佛教文化原本是英语国家读者不熟悉的，但众多中国文化典籍的英译或多或少让英语国家的专业读者对中国佛教文化有所了解，并且《边城》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作者沈从文的宗教意识——泛神论思想和“他文学上的‘美与爱的新宗教’思想”（王学富 1996：186）。译者直译是出于向西方读者准确传递一些东方宗教文化的考量。

3.12 尾注补益

“有些译者在译文之后另加注解，以补不足，而便读者，便有学者气象。”（余光中 2002：172）《红楼梦》译者 Hawkes 说，“小说里的注太多读起来就像上着镣铐打网球一样”（Hawkes 1977：18）。为了避免给读者“上镣铐打网球”的感觉，金介甫在小说正文中无一处使用“显性”译注，而为了“补不足，便读者”，在书末尾列出长达 7 页的 33 个尾注（Kinkley 2009：163－169），解释原文与译文文化的差异、与文章主旨相关的一些技术性问题和意义多变的词语等。33 个尾注的内容涉及社会生活习俗（9 个），文学人物或历史典故（9 个），作品故事中人物、地理、历史（7 个），宗教文化（1 个），关于原作版本的选择、修改、作者其他作品的英译本介绍（5 个）和其他内容（2 个）。为避免干扰读者阅读，尾注涉及的对象在正文中均未作任何标记。这些尾注以“密集注释”方式“让译文处于一种丰富的文化及语言语境”（Appiah 1993：817），有助于目的语读者更深刻地了解原语文化习惯、思维方式等，从而激发目的语读者对原语文化更加尊重，同时为专业读者或研究者提供有价值的相关文献和进一步阅读的资料信息。徐敏慧认为，大量尾注的使用使金介甫的《边城》译本带有明显的学人译者的翻译痕迹（Minhui Xu 2012：161）。

3.13 文内细译

细译指译者在译文文本中通过将原作的隐含信息明晰化，添加原作中未提及的信息等手段来解释原作的意义与内涵。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正文里略加扩充”（Hawkes 1977：17），“阐译”和“释译”（许国璋 1991：248）或“隐藏式译注”（李德超 王克非 2011：79）。“翻译目的，在于便利不懂外文之读者，如不懂外文之读者读之不懂，翻译者不能说尽到责任。”（许国璋 1991：248）因此，细译也是译者尽责任的手段之一。金介甫在 *Border Town* 中使用大量细译，那是译者带有目的的解读，大多起到准

?1994-2015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确传达原文内涵的作用。例如:

② 车是车路,马是马路,各有走法。大老走的是车路,应当由大老爹爹作主,请了媒人来正正经经同我说。走的是马路,应当自己作主,站在渡口对溪高崖上,为翠翠唱三年六个月的歌。(沈从文 1983:116)

这是大老托人探听老船夫是否愿意把翠翠许给他时老船夫说的一段文字。"车路"、"马路"和"三年六个月"蕴含丰富的中国文化信息。"车"和"马"都是中国象棋的棋子,车在中国象棋中念文言音"居"(jū),不念"砗"(chē)。"车路"、"马路"分别指车、马的走法。"车"在整个棋局中通常被视为攻击力最强的棋子,有"一车十子寒"之称。"马"的移动称为"跳马"。中国象棋中的"马"颇有骑士风度,自古有"马踏八方"之说。"三年六个月"出自一首民歌"你歌莫有我歌多,我歌共有三只牛毛多;唱了三年六个月,刚刚唱完一只牛耳朵"(刘洪涛 2003:42)。《边城》对苗族对歌习俗的描写既浪漫又传奇,不仅充满奇幻的异乡魅力,也将湘西人民自由原始的生命力展现出来。如此多的文化信息要移植到目的语,难度可想而知。译语读者的接受能力和期待是操纵译者的主要因素,作为汉学家,金介甫既谙熟大中华文化又熟悉美国读者,他将老船夫的话译成:In a game of chess, the chariot-the rook-moves one way and the horseman-the knight-another. If No. 1 wants to make his move directly like a chariot, his father ought to ask a go-between and put the proposition to me in the proper way. If he wants to move like a horseman, hurdling all obstacles, it's his play, to stand on the bluffs across the creek from the ferry and sing for Cuicui's heart until he's won her-for "three years and six months", if that's what it takes, as it says in the song. (Kinkley 2009:80)

译者将目的语读者陌生的中国象棋中的"车"(chariot)、"马"(horseman)与他们熟悉的国际象棋中角色和走法基本相似的"城堡"(rook)、"骑士"(knight),同时放到译文中,通过加词等方法将原语文化中不言自明的内容在译文中加以阐释,消除"车"、"马"、"车路"、"马路"的陌生性,增加译文的可读性;同时,让"对歌赢得爱人芳心"、"三年六个月"等浪漫传奇的、具有异质性的中国文化通过细译的方式在译语中再现,增加文本的吸引力和魅力。译者在保证译文可读性的基础上,将原文本中人物的心理构思过程和语言表达内涵在译语文本中表达清楚、到位,使译文甚至比原文更清晰、易懂,确实是难得的移花接木催生异彩的佳译。

3.2 文化妥协——操纵的处理

孙艺风说,"无视原本固有的文化距离,对相去甚远的源语与译入语文化规范不加理会,使远离自己熟悉的语言和文化家园的译入语读者,陡增无可奈何的无助感"(孙艺风 2013:9)。文化距离无时无刻不在操纵着译者,迫使译者努力寻求适当的移植方法,采取必要的妥协手段,适当控制两种语言文化间的距离。"适当控制"并非"尽量缩短",因为最短距离并不总是最佳距离。这样的妥协可能是无法保留原语表达形式时,尽量顾及语义或文化信息的传达的让步;也可能是原语文化中的文化词汇或表达在译语中空缺时,译者在译语中寻找相似或相近的词汇或表达予以替代。这样的妥协是一种积极的让步,是一种文化上的扬弃。

③ "你个悖时砍脑壳的!"(沈从文 1983:91)/"Damned low-life! You're beaded for the executioner!"(Kinkley 2009:35)

"悖时砍脑壳",在湘西、川渝一带,一般用来诅咒人会倒霉,会有报应,不会有好结果。但有时在一定的语境下也可用来表达"亲昵"。翠翠等爷爷等得焦急,又以为二老欺负了她,有些恼怒和害羞,对着二老骂出这么一句,既是当时情感的宣泄,也带有一定程度的攻击性。很明显这么一句骂詈语带有鲜明民族色彩。译者处于两难境地"翻译时如果能保留詈词詈语表面指称语义和语言形式,可以起到文化传真的作用。但是,为了保留原语语言和文化特点而仅仅译出原文的指称意义,则又会忽视骂詈语语用意义的传译,会给译入语读者理解译文带来困难"(马会娟 2014:53-54)。金介甫首先选用美国俚语 Damned low-life! 把原语的语用意义传译到译语中;再将"砍脑壳"用直译的方式译为 You're headed for the executioner! 从整个句子看,译者在文化坚守中妥协。也许译者在一定程度上回答了 Venuti 推崇异化翻译时提出的反问"译者能够与本国规范保持一个临界距离,同时又让译作免遭不可读的命运吗"(Venuti 1998:84)?译者在这里跟原语国家和目的语国家的文化规范均保持着一个刚刚好的"临界距离"。

Border Town 译序的中文译者安刚强(2010:3)说,"作为《边城》的英译者,金介甫有着别人所不可能同时具备的得天独厚的条件和优长"。因而译者能够较为透彻地分析文本内、外的操纵因素,根据需要灵活运用异化、尾注、细译、妥协等操纵手段,成功将丰富的原文文化移植到译语文本中,使译语文本在目的语国家受到欢迎和接受。"金介甫的《边城》译文既呈现出沈从文的风格也显现出金介甫的特点。它比原作提供的信息更多,赋予原作被 Benjamin 谓之'来生'(after life)的新的生命"(Minhui Xu 2012:161)。

3.3 拙译、误译——操纵的畸变

《边城》是一部"文化隐喻被提升到民族、国家的形象层面上的作品"(刘洪涛 2003:103),其中的文化习俗有浓厚的苗族特点,尽管沈从文"用整体意义上的中华民族概念置换了苗族文化"(同上:114),但苗族这一文化大背景却在字里行间透出来。沈从文自己也在《边城》题记中

?1994-2015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指出，“它对于在都市中生长教育的读书人来说，似乎相去太远了”，“我所写到的世界，即或在他们全然是一个陌生的世界”（沈从文 1983：72）。对于中国有些读者来说尚且是“陌生的”、“相去太远”的，对于美国人金介甫而言理解失误、曲解自然难以避免。

3.31 称谓语翻译失误

现代汉语中经常有亲属称谓泛化为非亲属称谓或拟亲属称谓现象。《边城》中出现大量把亲属关系称谓引申为非亲属称谓的情况，其中出现最多的有“大老、二老、伯伯、老伯伯、爷爷”等。“伯伯、老伯伯、爷爷”是普通汉语中的亲属称谓，“大老、二老”是湘西文化中特有的对于有两个儿子的家庭中“大儿子”和“二儿子”的称呼，如果家中只有一个儿子，家里长辈就称其为“老老”，即“弟弟”的意思。

假借亲属称谓通常显示 3 方面信息：年龄、地位和两人关系。作为汉学家的金介甫自然知道假借亲属称谓的含义，不知是否“不愿意放过这种具有中国文化神髓的含义”（孔慧怡 1999：142），将小说中几乎所有的引申亲属关系采用了逐字对译的做法。于是，出现小说中船总顺顺以及他的两个儿子天保大老和傩送二老都称呼翠翠的祖父 uncle 或 old uncle（Kinkley 2009：55，70，147）。尽管我们不担心会出现孔慧怡说的：uncle 的引申亲属称谓可能在美语文化中引起反感或者会招来一场灾祸。但是，这很可能会给英语读者带来两方面的困惑：（1）顺顺、天保、傩送之间是什么关系，是同辈人吗，是兄弟吗；（2）翠翠称为 grandfather 的老船夫是天保和傩送的 uncle，那么天保和傩送就应该是翠翠的 uncle，翠翠与天保和傩送的恋情就应该是“乱伦”，难道中国没有乱伦的观念吗？如果 *Border Town* 的读者可能会从阅读中得出这样的理解，实为译者的不幸。湘西文化中人们对于年长的中年男性都可称呼为“伯伯”或“老伯伯”，除非认为对方真的很老才会称呼“爷爷”，所以天保和傩送兄弟都称呼翠翠的祖父“伯伯”是为了讨好，说他年轻；他们的父亲船总顺顺是跟着自己的孩子称呼翠翠的祖父“伯伯”，这在湘西文化中也极其普遍。但是，将这些“伯伯”、“老伯伯”逐字对译成英语却实在欠妥。

假借亲属称谓的基础是虚拟的关系，这种关系必须随着交际场合、交际参与者身份、地位和交际角色的变化而改变。对于“大老”和“二老”，译者直接译成“No. 1”和“No. 2”。这既不能传递作父亲的“稍稍见得溺爱那第二个儿子”（沈从文 1983：84）的命名初衷，还可能让人产生 No. 1 is superior to No. 2 的误解。是否可以舍假借亲属称谓而不用，直接代之以人物的名字，以配合西方同类关系所用的称呼方法？

3.32 宗教元素翻译欠慎重

说到船总顺顺给两个儿子取名字，作品中写道：

④ 由于这点不自觉的私心，他把长子取名天保，次子取名傩送。意思是天保佑的在人事上或不免有龃龉处，至于傩神所送来的，照当地习气，人便不能稍加轻视了。（沈从文 1983：84）/This unconscious preference led him to name the elder son Tianbao（Heaven-protected），and his younger brother Nuosong（Sent by the Nuo Gods）. He who was protected by Heaven might not be so favored in the worldly affairs of humans，but he who sent by the Nuo gods，according to local understanding，must not be underestimated.（Kinkley 2009：21－22）

金介甫将这里的“天”对应 Heaven，傩神对应 Nuo Gods. 这样的直译英语文本在基督文化盛行的国度，可能因为与其宗教信仰相抵触而引起目的语读者的不快，甚至拒绝阅读。而“一个国家的社会文化本身的情况决定外来成分的或荣或枯”（王佐良 1984：5）。读者是否接受在很大程度上决定译文作品的生存与消亡。为了减少不必要的麻烦，对这一段文字杨宪益、戴乃迭采取删除的办法，把涉及宗教的内容予以省略：He had a soft spot in his heart for the younger，giving him the name Nuosong，his brother that of Tianbao（杨宪益 戴乃迭 2013：28）。表面看来，似乎杨、戴的译文有对原文的“不忠”之嫌，但“从翻译文化史角度看，译本的忠实程度与该译本在文化沟通上的作用之大小并无绝对的正比关系”（王克非 1994：59）。

3.33 语言文化被曲解

操纵一般情况下是译者受到文本内、外因素的操纵有意而为之，但有时操纵可能是译者的疏忽或误解造成的操纵畸变或者操纵失误。

《边城》中有一个情节：傩送二老邀翠翠和爷爷一起吃完饭后去看划船，自己先回去找人来替他们守渡船，翠翠用渡船把他送到对岸。

⑤ 砰的一下船头已撞到岸边土坎上了，船拢岸了。二老向岸上一跃，站在斜坡上说“翠翠，难为你！”/The boat reached the shore with a thud as it bumped into a mound of earth. No. 2 jumped up on the bank and said，from the slope：“Cuicui，I've put you to trouble. When I get home，I'll send someone to take the place of both of you.”

从情景上分析，翠翠用渡船把二老送到对岸，二老站在斜坡上说的话，一定是表示感谢。这句“难为你！”就是“谢谢你！”的湘西方言表达。而金译的 I've put you to trouble 在西方文化中是无论如何都无“感谢”意味的。金译只是将“难为你”的字面意思译出，而忽略了语境意义。

3.4 文化意象被遗失的薄译——操纵的失控

薄译是相对于厚译以及细译而言，指本该厚译、细译的内容被译者用极少的文字表达，造成文本内、外因素对译者的操纵处于失控状态。《边城》中翠翠与天保、傩送的爱情故事开始于“端午节”，“端午节看龙船”是贯穿整

?1994-2015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个小说的重要事件，地点是河街上的“吊脚楼”。作者选择这样的时节、这样的地点不仅是因为“端午节”、“吊脚楼”在苗族文化中的典型性和特殊性，而且考虑到其文化意象给读者带来的联想效应。因为“文化意象大多凝聚着各个民族的智慧和历史文化的结晶”（谢天振 1999: 180）。在原语文本中，因其广泛的文化认同，作者不需做太多的渲染读者即能心领神会，但对于外国读者却会带来明显的理解障碍。厚译、细译姑且难以避免文化意象的损失或变形，薄译必然导致文化意象的失落。文化意象的失落就意味着文学作品灵魂的丢失。既然在书的末尾，译者给出 33 个尾注，像“端午节”、“吊脚楼”等具有重要文化意象的成分，同样可以考虑以尾注的形式将意象进行解释，使意象明晰化，从而减少译文读者的推理努力。

4　结束语

个人意识形态操纵着译者对作者和作品的选择，社会意识形态操纵着译者翻译策略和手段的选择，文本内、外因素共同作用于原语文化的移植。文本内、外因素不仅包括原语文本作者的写作风格、写作目的、诗学态度，还包括广泛的社会和文化语境等，他们形成一个看不见的“网”共同操纵译者，操纵译者的整个文化移植过程。金介甫在《边城》中采用异化、尾注、细译、妥协等手段移花接木催生众多的精彩佳译。其中也出现不少操纵的畸变，如称谓语的翻译失误、宗教成分内容翻译欠谨慎、语言文化被曲解、文化意象被遗失等，这也许是译者无意为之，抑或是译者疏忽所致，但同时也从另一个侧面提醒我们关注译者的身份。中国文学作品外译“借船出海”是一个思路，但“中西合璧”也许更可取。

参考文献

Jeffrey，C. Kinkley. 永远的“希腊小庙”——英译《边城》序［J］. 吉首大学学报，2010(4).

Jeffrey，C. Kinkley. 凤凰之子·沈从文传［Z］. 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4.

李德超 王克非. 译注及其文化解读——从周瘦鹃译注管窥民初的小说译介［J］. 外国语，2011(5).

刘洪涛.《边城》：牧歌与中国形象［M］. 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2003.

刘　勇 张睿睿. 星斗其文，赤子其人——走进沈从文的《边城》［M］.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马会娟. 汉英文化比较与翻译［M］. 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有限公司，2014.

沈从文. 沈从文文集（第六卷·小说）［Z］. 广州：花城出版社，1983.

孙艺风. 翻译的距离［J］. 中国翻译，2013(6).

王克非. 论翻译文化史研究［J］. 外语教学与研究，1994(4).

王学富. 沈从文与基督教文化［J］.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6(1).

王佐良. 翻译中的文化比较［J］. 中国翻译，1984(1).

谢天振. 译介学［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9.

许国璋. 许国璋论语言［M］. 北京：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1.

徐敏慧. 沈从文小说英译评述［J］. 外语教学与研究，2010(3).

沈从文. *The Border Town*［Z］. 南京：译林出版社，2013.

余光中. 余光中谈翻译［M］. 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2.

Appiah，K. A. Thick Translation［J］. *Callaloo*，1993(4).

Bassnett，S. *Translation Studies*（3rd ed.）［M］. London & New York：Routledge，2002.

Bassnett，S. & A. Lefevere. *Constructing Cultures：Essayson Literary Translation*［M］. Trowbridge：Cromwell Press，1998.

Dukāte，A. *Translation，Manipulation and Interpreting*［M］. Frankfurt：Peter Lang，2009.

Hawkes，D. *The Story of the Stone*（Vol. 2）［M］. Harmondsworth：Penguin Books，1977.

Hermans，T.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ture：Studies in Literary Translation*［M］. London：Croom Helm，1985.

Kinkley，J. *Border Town*［Z］. New York：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2009.

Lefevere，A. *Translation/History/Culture：A Sourcebook*［M］. London & New York：Routledge，1992a.

Lefevere，A. *Translation，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M］. London & New York：Routledge，1992b.

Minhui Xu. On Scholar Translators in Literary Translation — A Case Study of Kinkley's Translation of ‘Biancheng’［J］. *Perspective：Studies in Translatology*，2012(2).

Venuti，L. *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A History of Translation*［M］. London & New York：Routledge，1995.

Venuti，L. *Scandals of Translation*［M］. London & New York：Routledge，1998.

收稿日期：2014－03－01　　【责任编辑　孙　颖】

?1994-2015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